日本学者关于清代秘密宗教的研究

宋　军

日本史学界早在四、五十年代即开始了对中国清代秘密宗教的研究，六十年代以来这一研究又有了深入发展，并取得了诸多成果。虽然所得结论未必全部恰当，但仍值得我国学者参考和借鉴。

一、对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的研究

研究清代的秘密宗教，必然涉及嘉庆初年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在日本关于这次起义的最早论著是矢野仁一的《关于白莲教之乱》（《祝贺内藤博士花甲、支那学论丛》，弘文堂一九二六年）。矢野认为：嘉庆年间清政府尚未丧失民心，虽然白莲教在教义和实际行动上都具备了革命的性质，但其思想并没有被广大群众普遍接受，而白莲教在起义过程中也没有表现出它的革命性。所以，这次起义属于“流寇式的叛乱”，基本上以唯恐天下不乱的“匪民”和极易被煽动胁从的百姓为群众基础。接着，佐野学在《清朝社会史》（文求堂，一九四七年）第三部的《农民暴动》中指出，白莲教虽然具有浓厚的政治性，但其政治纲领却是暧昧和不彻底的，且带有排外的“种族主义色彩”。

一九四八年以后，铃木中正连续发表文章，系统地研究并阐明了这次起义的始末、背景以及地域特殊性。先后写有《清代宗教叛乱的性质》（《东洋文化研究》九.一九四八年)、《清朝中期史研究》（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一九五二年）及《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与宗教》第十章《清嘉庆朝白莲教之乱》等文章。认为白莲教本来是立足于追求个人福利的宗教组织，并没有展开反抗斗争的倾向，然而在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和残酷镇压下，逐渐带有政治色彩，采取暴力与之对抗。安野省三在《清代农民叛乱》（《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十二、一九七一年）中继承了上述研究成果，并进一步加以阐发。认为清代川陕楚三省交界地区移民的大量出现，是广大民众抗税斗争的形式之一，它起因于对地主强迫交纳划一的货币地租的反抗。

一九七三年，小林一美发表《抗租、抗粮斗争的幕后》（《思想》第584期）一文，主要探讨了白莲教与广大农民抗租、抗粮斗争相结合的背景。指出白莲教通过参与和领导抗租、抗粮斗争，逐渐使这种经济斗争向革命运动过渡。随后，小林在《从白莲教叛乱到义和团》（上、下）（《再建历史学》二、三、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一文中，更加具体地指出了义和团在世界观上与白莲教的密切联系，这种思想上的继承性对义和团的扶清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小林的另一篇力作《嘉庆白莲教叛乱的成员、组织、军队》（《再建历史学》四、一九七九年），主要根据《戡靖教匪述编》、《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等史料，研究了嘉庆白莲教起义领导人及各地区教徒的出身，并列表以资理解。其后，小林又发表了《结构上异化的叛乱》（《再建历史学》四、一九七九年）及《嘉庆白莲教叛乱的性质》（《中

嶋敏先生古稀纪念论集》上，一九八〇年），强调指出这次起义的主要成员，大多是社会上的弱者、流民、失败者、下贱的人等所谓“被社会抛弃的人”。小林特别突出地论述了封建社会受虐待迫害的代表—女性在起义中的作用，认为她们是起义的原动力之一。不久之后，小林又撰写了《中国白莲教叛乱中帝王与圣母—准共同体二元论的世界》（《再建历史学》五、一九八〇年)一文,更进一步地发展了上述理论，认为白莲教起义是被社会抛弃的人为了实现自我而进行的恢复人格的斗争。由于他们丧失了以村落、宗族为象征的社会共同体，于是便组成了独自的、突破了血缘与地缘关系的组织—准共同体，并由此孕育、产生了共同的信仰和相互扶助的人际关系。

小林一美一贯将白莲教作为“邪教”共同体来把握，探求它所有的反功能。他的《齐王氏叛乱—嘉庆白莲教叛乱研究序说》（《续中国民众叛乱的世界》、一九八三年）一文，明确地表述了这一观点。此外，小林还指出，白莲教在幻想出天上王权这一帝王理论的同时，还创造出了它的对立面—圣母理论，从而形成了二元论的世界观。

二、对清代其它秘密宗教的研究

有清一代，出现了大量以罗祖为宗师的秘密宗教。对此，铃木中正于一九四三年发表了《关于罗教—清代中国宗教结社史一例》（《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一）一文。认为罗教主要是以有一定资产、附着于土地、通过地缘及血缘关系固定于一般社会共同体之中的人们为主体，一般不包括土匪、无赖、流民、游民等“反社会势力”，具有较强的宗教色彩的宗教团体。此外，还论及苏杭地区的水手结社，认为它是基于同业相助这种社会连带关系，为了保障生活安定而成立的。

一九五二年，《东方学》第三期上刊登了市古宙三的《朱九涛考》。指出朱九涛并没有参加太平军，只是见太平天国日益强大，便自称太平王，以借其威。市古认为朱九涛是湖南人，与当地斋教即青莲首领邱倡道是同一个人。而《平定粤匪纪略》中所记朱九涛为广东上帝会或三点会首领，洪秀全曾师事朱九涛，纯属杜撰，不足为信。

一九五四年，泽田瑞穗撰写了《八卦教源流》（《国学院杂志》,五十五卷,一号，一九五四年）。介绍从乾隆至道光年间八卦教之案例，推测其源流可能反映在顺治十二年刻印的《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之中。另外，泽田还通过对宝卷的研究，阐明了许多宗教结社的实质及其内容。他在《道光白阳教始末》（《东方学论集》一、一九五四年）一文中，认为白阳教与白莲教、八卦教相近似，都具有高度的军事暴力色彩。

泽田《初期的黄天道》一文，在阐明了黄天道的特点之后，指出它与雍正年间的皇天道有关联。

森田明在《论清代水手结社的性质》（《东洋史研究》十三卷五号、一九五五年）一文中指出，不同于一般罗教结社的漕运水手结社，虽然表面上也信奉罗教，却具有自己独特性质。水手大多是被剥夺了生活手段、衣食无着的无业游民，他们脱离了家族、村落和固定职业，生活来源没有保障。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对付官方压迫，水手结社应运而生。因而它并非单纯的宗教团体，实质上是互相扶助。保卫共同利益的工会式组织。而罗教庵堂，既是水手冬季粮船停驶时的生活场所，也是奸商、走私贩的落脚点及走私货物的集散地。

嘉庆年间，华北地区发生大规模骚乱，白莲教支派—天理教的活动是其重要的组成部

分。小野田计雪子在《论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徒之乱》(《史草》七、一九六六年)中认为，它们的组织大多是由同乡或同族结合而成，农民是基本成员，也有下层知识分子参加。

一九七四年出版的《中国的革命与宗教》(东京大学出版会)中，收录了铃木中正题为《清代宗教叛乱的性质》的文章。认为清代罗教之所以在不同的地区以不同的名称出现，除为了躲避官府的镇压外，也是为适应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需要，而在教义和组织上进行的某些调整。铃木强调指出，罗教最初并不带有政治色彩，只是在清政府采取了严酷的取谛政策之后，才逐渐向反清的暴力组织过渡。

关于林清、李文成起义的研究，有佐佐木正哉撰写的《嘉庆年间时白莲教结社—林清、李文成集团》(《国学院杂志》七七卷三号、一九七六年)，文章通过研究坎卦教教主林清的生平，阐明了该教的宗教系谱，即由混元、弘阳教经八卦教至坎卦教的发展过程。指出坎卦教与震卦教有许多类似之处。并且论及当时华北地区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与该地区出现基于白莲教三际说和弥勒降世信仰宗教运动之间的联系。

一九七七年，浅井纪发表《论道光青莲教案》一文(东海史学》十一)，揭示了青莲教的组织、教义、系统及其与一贯道的关系，以及从罗教到无为、金丹道再至青莲教的发展变化过程，以及该教与会党互为表里，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同治年间江西南部出现的罗教支派真空教的研究，有野口铁郎的《真空教与无为教—兼论廖祖经与罗祖经》(《历史人类》九、一九八〇年)一文，认为真空教所持经典，大多与罗祖的《五部六册》有密切关系，该教采取了辅佐政府的姿态，属于宗教慈善团体。

一九八一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研究论集》中刊登了铃木中正《乾隆十七年马朝柱的反清运动—中国民众乌托邦运动之一例》一文。铃木认为这次起义的主要成员是进入大别山区开山烧炭的贫苦移民，马朝柱还吸收了许多商人加入组织，并通过他们控制和掌握农民，但是他们之间的宗教连带意识十分薄弱，不可能形成强有力的反清势力。铃木指出，官府在追查马朝柱案件的同时，对那些一直得到默认的宗教集团也一概加以取谛，由此增强了他们的反清情绪。“于是就形成了官方镇压与宗教集团强硬化的恶性循环，这在乾隆三十九年的王伦起义中趋于顶点，至乾隆末年再度达到高峰，终于导致了嘉庆白莲教起义的爆发”。次年，铃木继续发挥其上述恶性循环观点，并引用了欧洲农民千年王国运动的理论，分析活跃于清中期的秘密宗教。《清朝中期民间宗教结社及其向千年王国运动的倾斜》(《千年王国民众运动的研究》、一九八二年)一文，论述了罗教、闻香教、收元教、无为教、清水教等教派在雍正、乾隆年间势力的消长。在清政府的弹压下，这些教派在乾隆五十年以后，互相取得联络，形成了联合行动的趋势，为嘉庆初年白莲教起义奠定了基础。

随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册的问世，日本学者开始了有关清茶门教的研究。浅井纪的《明清时代的闻香教与清茶门教》(《千年王国民众运动的研究》、一九八二年)，详细论述了其源流、布教活动，宗教仪式、教规、经卷与信仰。指出，清茶门教既宣扬弥勒降世、普渡众生的现世利益，又具有反清复明的千年王国思想，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侧重。由于教主王氏家族强有力的控制，使得该教在清政府严厉打击下仍得以长期延续。

关于江西各种秘密宗教的融合情况，有野口铁郎撰写的《清末江西的红白黄教》(《历史中的民众与文化—祝贺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纪念论集》图书刊行会、一九八二年)一文。认为同治年间江西省及其临近地区出现的红教、白教、黄教，实际上是同一秘密宗教的三个组

成部分。由黄教经白教至红教，反映了所谓宗教修行的逐步深化及政治色彩的逐渐加深。该教与斋教、拜上帝教、青莲教、红莲教、灯花教、哥老会及“苗匪”都有密切的联系。一九八三年，野口又发表了《红莲教与哥老会》（《东洋史研究》四十二卷三号）一文，力图揭示红莲教的性质、历史地位、与其它秘密宗教及会党的关系等问题。认为同治年间活跃于江西西北部、湖南东北部的红莲教本身并没有特定的经卷，它只不过是直接继承了以往秘密宗教的信仰，尤其与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受到道光年间青莲教的影响。野口根据该教内部的隐语、入教程序及清朝官吏奏折等内容，断定红莲教即是哥老会。进而认为哥老会最初先以宗教为伪装，诱使广大无业游民、散兵游勇以及亡命之徒入会，然后再逐渐向反清的武力集团转化，但仍保留其富有宗教色彩的名称。野口还发表了《“斋匪”与“会匪”》（《中国近代史诸问题》、一九八四年）一文。通过对道光年间江西南部以谢词封为首的罗祖教进攻长宁县城事件，以及楚潮泗纠集三乘教事件的研究，得出二者同属罗教系统的结论。从道光末年江西、湖南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该地的“斋匪”与会党日趋一体化。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社会基础，都以广大下层民众为主体。

以上关于日本学者对清代秘密宗教研究成果的介绍，由于条件所限，部分专论未能见到原文，许多地方参考了野口铁郎先生所著《明代白莲教史研究.付编.清末江西秘密宗教与其向近代的倾斜》（雄山阁，一九八七年）一书中的有关章节，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问世

任　清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陈支平副教授的新著——《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一书，最近已由厦门大学出版社问世。全书近二十万言，凡三卷。卷一《清代赋役财政制度的演变》；卷二《清代福建赋役失控与官僚士绅》；卷三《清代更名田立法及其赋役负担》。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教授生前为该书撰写序言指出：“此书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囿成说，证据平实，持论新颖。研究明清赋役制度的演变，以及更名田立法的性质，他并不局限于制度史的考证，也不轻信统治者的官方记载，而是广收博证，结合当时社会、区域经济诸特点，考察各种制度的实施状况和变化原因，成一家之言。”通观全书，确然史料翔实，持论新颖，足证衣凌先生于序言中所述绝非过溢之词。傅先生在序言中还指出：陈支平同志年富力强，勤于治学，涉借甚广，此书只是他的部分研究成果，期望他再接再励，写出更多更好的新著。《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作为一本清代社会经济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可谓是新人、新著、新论，颇值得一读。